

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

多杰仁宗 满当烈 晁元清 王玫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青海师范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

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

多杰仁宗
满当烈
晁元清
王 玫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新编目（CIP）数据

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多杰仁宗等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311-03495-5

【作 者】多杰仁宗等著

【出版发行】 兰州市：兰州大学出版社 ， 2009

【ISBN号】 978-7-311-03495-5

【页 数】 269

【原书定价】 42.00

【主题词】喇嘛教-宗教音乐-研究-青海省-喇嘛教-宗教文化-
研究-青海省-喇嘛教-宗教音乐-宗教文化

【中图法分类号】 J608;B946.6 （艺术>音乐>音乐理论>宗教音乐研究）



序一

一项拓荒性的研究成果

赵宗福

我曾经说过:青海是一个神圣、神奇、神秘,令人神往的地方。如是说并非仅仅因为自己生长于斯土,情感寄予斯土,而是因为通过粗略的文化比较,深深感到青海作为多民族地区,文化形态上呈现为多元互融、和谐共荣,尤其是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悠久的历史传承、鲜明的文化个性、神秘的信仰色彩而备受世人的关注与向往。如荒老诡奇的阿尼玛卿传说、隐真显幻的青海湖祭海、朴野狂欢的黄南六月会、仪典谨严的三川纳顿节,还有数不清的神圣肃穆的佛教寺院文化,都足以使人荡气回肠、激情飞扬。

然而令人颇感惋惜的是,对这些文化的完整系统的调查梳理和学术文化层面的研究还远远未能形成可观的局面,许多方面甚至还是白茫茫一片,至今见不到几篇像样的评介文章,青海文化尤其是深层次的文化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阶段。这样的遗憾影响了对青海文化的整体把握和细微描述,也影响了国内外对青海地位的文化认知和理性评价。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有幸先睹为快,拜读了多杰仁宗教授等人的新著《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我虽然对音乐文化是外行,但凭着对青海文化的特殊情感和对文化人类学的一般常识,还是通读了全书,受到了很多教益。作为外行的我虽然不敢对音乐文化妄加评论,但就凭我的





通识感觉,以为此著的贡献至少有三点:

一是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青海的藏传佛教音乐文化。青海的音乐文化多元丰富,以我之见,从文化分层来讲,至少可以分为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当代音乐三大类;从民族属性来划分,至少有藏族音乐、土族音乐、撒拉族音乐、蒙古族音乐、回族音乐、汉族音乐等;从宗教信仰文化圈来说,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还可以分为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伊斯兰教音乐文化、汉族释道音乐文化三大类。而藏传佛教音乐文化是其中藏量最为富有、民族地域特色最为明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来颇受音乐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但是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调查梳理,除了几篇零星的描写性文章外,还尚未见到这一主题的专著。而此著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梳理和评述了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既有宏观的理论把握,又有微观的深度描写,条分缕析,蔚为大观。从这一角度看,此著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堪可贺赞。

二是调查方法科学,描述准确可信。中国传统的学术重书面文献,轻实地调查,随着近代西方学术方法的输入,面向民间生活的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学者充分利用民间作品展开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成果。比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歌谣周刊》面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仅《隔着帘子看见她》一首歌谣的异文就从全国十二个省区搜集到一万多首,著名学者董作宾先生从中选出四十五首同母题的《隔着帘子看见她》,从风俗、方言和文艺三方面进行分析,从服饰打扮等分析中看各地民俗的不同,从艺术结构解析中看各地文学创作风格形式的差异,从语言分析中看方言与地方文化的语言学研究意义,撰写了《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一文。钟敬文先生称赞“其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文学研究文章”,与顾颉刚的孟姜女传说研究堪称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的学术双璧。又如花儿研究家张亚雄先生在“坐地征花”的同时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撰写了第一部花儿研究的专著《花儿集》,成为花儿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这些学术成果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深入调查在研究民间文化上的



重要性。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调查理论方法的系统研究和科学传承不足,田野工作的理论体系未能建立,大多数人的实地调查往往停留在“采风”的层面上,科学性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调查研究的学术层次。此著课题组在启动之日,便在科学田野上自觉准备,之后不仅深入宗教场域,而且严格调查程序,科学整理资料,从文化层面进行阐释性描述,因而一读此著,便有一种严谨规范的学理感。所以这是一部“深度描写”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力作,学术含量高,为青海省科学的民族民间文化田野调查研究探索了路子。

三是颇多学术创见,富有学术创新。书稿中有些篇章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文化事象描述,而是有着较深的学术思考和强烈的学术表达,如对佛教古乐谱的解译就是在藏传佛教音乐研究上的一个突破,貌似简单的描述背后充满了作者的研究智慧和诸多艰辛。同时把藏传佛教仪式仪轨中的音乐事象,放在民族音乐文化的大背景上予以观照,分析音乐与民族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宗教音乐与民族审美情趣的互动,进而全面解读宗教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处处显示出了作者不俗的学术眼光。能有如此学术见识,是与课题组成员的身世阅历和学术素养分不开的。多杰仁宗先生、满当烈女士早已是造诣甚高的藏族、蒙古族音乐艺术家,他们自幼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在人生和专业实践中体验着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内涵和韵味,进行着长久的学理性的艺术思考和规律总结,这就从亲缘关系上保证了研究评价的准确性和学术性。而晁元清、王玫女士长期在高校从事音乐文化的教学研究,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细微处有着独特的感受和理解,且能从宏观上进行理论的准确把握。如晁老师作为土生土长的歌唱家,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和泰国成功地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受到广泛的好评。此著因为出自这样一个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学术团队,在学术上有很好的创新也就顺理成章了。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我对此著的赞赏是由衷的。当然作为多人合作的著作,难免还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之处,但作为拓荒性的而且富有成就



的一项工程,这些不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说到此著,我想还不能忘记刚刚去世的田俊慧先生。青海师范大学的一些学科在科研方面略显弱势,我作为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力主对这些学科多加以扶持,故多次帮助谋划建设方案。当时任音乐系党总支书记的田先生也积极奔走,力图在学科建设上有所建树。记得是2005年元月,他和多杰仁宗先生等人来找我,说他们已经承担了田联韬先生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文化》青海部分的词条撰写工作,想请教一下如何调查写作。我当即建议策划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即扎扎实实开展青海地区的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田野调查,广泛汇集资料,全面深入研究,在圆满完成词条撰写的同时,拓荒性地撰写一部藏传佛教音乐文化方面的专著,并初步地设计了一个调查提纲和写作框架,还建议聘请米海萍教授作为青海文化史方面的学术顾问。之后在他的带领下,课题组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调研工作,可谓知难而进,披荆斩棘。期间他和课题组成员还就撰写体例、项目申报等具体事宜多次跟我交换意见。功夫不负有心人,《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项目逐渐成型,并获批为青海省社科规划项目和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2007年4月上旬,田先生终于捧着一大摞书稿到我办公室,要我做篇序。考虑到项目的起始与我还有点关系,我便不避浅薄,欣然应允。可是不到半月,不期他竟溘然去世,享年仅五十岁。作为同龄人和老同事,我倍感痛惜。尤其是他兢兢业业、锐意进取的精神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田俊慧先生为此著的形成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而成果出版时,他却永远见不到了,使人不胜惆怅,这篇序文也就成了纪念田先生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借此机会对课题组的团队业绩表示钦佩,更殷切期望音乐系的同仁们再接再厉,在青海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2007年4月27日于湟水之滨



序二

第一部藏传佛教音乐文化
研究专著面世

田联韬

中国的音乐学界期待了多年,第一部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专著《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终于面世了。这部内容丰富、分析细致深入的专著,是一项颇具规模的、具有学术深度的科研成果,它的问世,既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一件大事,从世界范围来看,它也会在国际音乐学界引人注目,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应该着重指出,完成这个课题的四位作者中,有两位是藏族、蒙古族的音乐学者,这是我们为之兴奋,为之欣慰,为之热烈祝贺的另一原因。

宗教音乐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传统音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学者必须关注的课题。而宗教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繁复的宗教仪轨与多种宗教禁忌,使得学者在进行宗教文化的考察、研究工作时,面临的学术难度与工作难度,远远大于对一般民俗文化的考察、研究。面对中国众多民族所拥有的复杂多样的人文背景与宗教文化,凡是有着少数民族的民俗音乐和宗教音乐考察研究经历的音乐学者,都会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有深切的体会。对于藏传佛教,由于它存在着多种教派,而众多寺院又分布于幅员广阔的青藏高原各地,因此调查、访问、收集资料等实地考察的工作更为艰辛,而其后对资料的分析、研





究,直到全面完成著作,则是更为繁重、吃力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当笔者见到由多杰仁宗(藏族)、满当烈(蒙古族)、晁元清、王玫四位作者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最终完成的书稿时,心中充满赞叹与喜悦之情。

—

作为国际显学之一的“藏学”,藏族的艺术,藏族的传统音乐是藏学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族传统音乐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民间音乐。分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五个省区的藏族居民的民俗生活中,流传着多种多样的、色彩绚丽的民间音乐。这部分音乐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民间器乐、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藏戏)5大类别,它们和藏族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以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思想感情。这五类民间音乐包含有许多歌种、曲种、剧种和数量惊人的曲目。藏族的三大方言区,如从这些地区流传的民间音乐的形态特点着眼,也可视为音乐的三大色彩区。在各个方言区,民间音乐又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有不同的歌种、曲种、剧种,还流传有不同的民间乐器。正是由于藏族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宝藏,长久以来藏区被人们誉为“歌舞的海洋”。

第二部分是宗教音乐。在广大藏区的居民中,传播最广泛最深入的宗教信仰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是传播于我国许多民族居民中的佛教三大支派。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由于共同的渊源,在祖师、教义、经文、神灵崇拜诸方面有不少共同之处。但由于不同的地域、历史、人文环境、文化背景、自然条件、原始信仰、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同样源于印度、同属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传播、发展过程,逐步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点。这在宗教艺术方面,特别是宗教音乐、宗教舞蹈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藏传佛教的宗教音乐艺术在世界宗教音乐之林中，以其雪域高原的特有风采和强烈的艺术震撼力而独树一帜。

第三部分是宫廷音乐。藏族的宫廷音乐，是指主要传承于西藏布达拉宫与扎什伦布寺^①的噶尔乐舞中的音乐。噶尔是一种专业表演性的、包含音乐与舞蹈元素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此种艺术形式的原型是在17世纪西藏五世达赖时期，来自西藏以西的拉达克王国。^②其后经历约300年的传承、演变而逐步定型。噶尔主要是为驻锡于前后藏^③的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及两地上层僧俗官员服务的乐舞。^④

虽然西藏并非独立王国，布达拉宫也非严格意义的王宫，噶尔仅是为中国西藏地方上层僧俗官员服务的艺术形式，噶尔乐舞及其音乐当然也并非严格意义的宫廷乐舞和宫廷音乐。但是考虑到西藏特殊的历史传统、西藏特殊的政治地位，与西藏持续数百年之久的政教合一的体制等诸多条件，以及噶尔乐舞独特的文化属性，我认为，噶尔乐舞的音乐可以归属于宫廷音乐一类。

噶尔表演由声乐、器乐、舞蹈等三种艺术形式构成，它既包含有器乐伴奏的舞蹈，也有歌曲演唱和器乐合奏。音乐的特征是平稳、和谐、舒展、优雅，表演中充满肃穆、庄严的气氛。从噶尔的音乐、乐器、曲目、舞蹈、服装等，即可清楚地发现，宫廷乐舞噶尔既保留了部分来自中亚的艺术特质与艺术形式，又融合了西藏本土和中原地区的多种艺术形式，噶尔乐舞艺术是比较典型的东亚与中亚、西亚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实例。

藏族传统音乐的三个部分，以民间音乐最为丰富。民间音乐的地域性特征，除了表现于上文所述三大音乐色彩区之外，还表现在地域覆盖面较小的嘉戎色彩区，^⑤以及四川西部各地以大散居小聚居形式分布的西番藏人居住地区。各地区流传的歌种、乐种、剧种、曲种，以及这些音乐种类包含的大量曲目、剧目，可说是色彩缤纷，琳琅满目。1949年以来，中国许多作曲家创作的优秀的藏族音乐作品，莫不汲取养分（或直接取材）于藏族民间音乐。



藏族的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在音乐形态方面具有迥然不同的风格特色,藏传佛教音乐与汉传佛教音乐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除了音乐风格、音乐形态的极大差异之外,在民间音乐与宗教音乐间的关系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也有显著不同的表现。与汉传佛教不同,藏族的宗教音乐虽然与民间音乐存在某些联系(主要在诵经音乐),但同时宗教音乐又与民间音乐之间有相当明显的界限,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二者使用的乐器与乐曲方面。另外,由于藏传佛教本身具有高度的规范性,虽然覆盖的地域甚广,各地有成百上千所寺院,但各教派的寺院所使用的音乐和乐器(法器)却具有相当高度的统一性。各地区的佛教寺院,即使相隔千里之遥,宗教音乐的共性仍远大于相互之间地域性的、局部性的变异。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寺院之间,以及建立于藏族不同方言区的同一教派的寺院之间,也有某些地域文化特色的反映,值得我们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索。

8

相对于藏族的民间音乐与宗教音乐,藏族的宫廷音乐噶尔乐舞由于其特定的服务对象,传播的范围较为有限。但噶尔乐舞的多元文化特色使其艺术形态独具一格,而与藏族的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迥然有异。噶尔最初建立在拉萨布达拉宫,其后传至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后又远传到西藏昌都,四川巴塘、甘孜等地的主寺。由于传播于古老年代,又远离母体本源,昌都、巴塘、甘孜等地的噶尔乐舞的艺术形态已发生较多变异,人员、节目、规模等都比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的噶尔简化许多,音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但观察其节目内容、表演形式、服装、道具、乐器等方面,源自西藏布达拉宫的传承关系脉络清晰可见。

二

让我们观察国外和中国的音乐学术界多年来对于藏族传统音乐的三大部分进行的考察研究工作,以了解国内外进行此项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国外(包括欧美各国与日本)音乐学术界对于

【序

二





藏传佛教音乐的调查、研究活动,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即开始有西方音乐学者在刊物上发表与藏传佛教音乐有关的介绍文字,^⑥60 年代开始出现专题论述藏传佛教音乐的论文。其后从 70 年代到近年,约有四五十篇论文、六七部专著和八九篇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出版或发表。这些专著与论文涉及的范围较广,其中较多的集中于研究藏传佛教的诵经音乐,也有的是研究藏传佛教音声结构,或是研究佛教寺院使用的乐器(如法螺、铜钦等),或是研究藏传佛教宗教乐舞羌姆,还有研究藏传佛教尼姑寺院宗教生活和诵经音乐的。其中仅有一部是比较全面地介绍与分析藏传佛教音乐的专著。该书作者是意大利籍音乐家伊万·万道尔(Ivan Vandro),他在 1976 年、1978 年先后用法文与德文出版了《西藏佛教音乐》(Music of Tibetan Buddhism)(此书的法文版与德文版内容相同)。

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国外音乐学者对藏传佛教音乐开展考察、研究的活动比较早,而且关注的范围比较全面,其中有的学者考察比较细致,研究也较有深度。前文述及的《西藏佛教音乐》是一部 64 开本的著作,书中包括了藏传佛教的历史源流、宗教仪式、寺院乐队、乐器、演奏技巧、音乐的领导者、铜钦与嘉林的曲目、面具舞蹈(羌姆)、器乐结构、音乐专用术语、记谱等诸多内容,还附有许多照片与图片。此书的优点是论述的内容比较全面,可说是面面俱到。其中部分章节,如对藏传佛教铜钦(大型铜号)、嘉林(类似唢呐的簧管乐器)、额阿(长柄鼓)等几种乐器演奏乐曲的记录,对几种乐器的乐谱“央移”的分析与转译,都作了十分细致的描述。此书的不足之处是对藏传佛教历史源流、文化背景、乐舞羌姆,以及音乐的结构形式分析等方面,内容或过于简略,或有所遗漏。但客观地看,此书作于 30 年前,在当时即达到如此水平,已属十分难得,虽有某些不足,以今日的眼光来评价,此书仍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总体而言,对于藏族传统音乐,国外音乐界对藏族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的研究成果较少,研究的重点相对集中于宗教音乐,而且已经取得不少较深入的成果,值得中国的音乐学界认真关注,从中汲取



有益的养分。

三

至于中国音乐学术界对藏族传统音乐所做的考察研究工作的情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50年代初,中国音乐家即开始深入民间,对藏族传统音乐做了大量收集、整理工作,其后数十年间陆续出版了多种出版物,⁽⁷⁾发表了多篇介绍性的文章和研究论文。但由于客观、主观条件的局限,关注的焦点长期比较集中于民间音乐。虽然对藏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取得比较广泛、比较深入的成果,但对于藏族传统音乐的另外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音乐与宫廷音乐“噶尔”,考察研究工作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才开始起步。在其后的近三十年时间,我国音乐家,特别是在藏民族聚居的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区工作的音乐家,对藏族的宗教音乐(藏传佛教与苯教音乐)与宫廷音乐噶尔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在宫廷音乐的成果方面,除了近年有多位学者发表了有关西藏宫廷音乐“噶尔”的研究论文外,⁽⁸⁾1991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极为珍贵的有关噶尔的古代文献《赏心、悦耳目之喜宴》。⁽⁹⁾书中包括文字说明与用指位谱记录的多首乐曲。

在宗教音乐的研究成果方面,从90年代起,音乐学者们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藏传佛教音乐的论文;由四川、青海、甘肃、西藏、云南等五个省、区负责编撰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各个省卷中,都包含了综述藏传佛教音乐的文字和多种宗教音乐曲谱;在先后编撰、出版的《中国宗教音乐》、《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国音乐大百科全书》⁽¹⁰⁾等专著中,都有集中论述藏传佛教音乐的部分章节。我国音乐院校的研究生也已开始以藏传佛教音乐为选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全面的研究。⁽¹¹⁾另外,各地先后制作、出版了许多直接采录的藏传佛教音乐的音响、音像制品。





由以上所述情况,可知近三十年来,除了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之外,有关藏传佛教音乐的考察研究工作,在我国也已取得不少成绩,考察、研究的内容也比较全面,涉及了历史源流、佛教教义、宗教教派、宗教仪轨、诵经音乐、羌姆(宗教乐舞)、乐器与器乐、传统乐谱(“央移”)等。但是,由于藏传佛教音乐包含的内容与形式极为丰富而且相当复杂,各方言区与各教派寺院的宗教音乐既存在共性,又有某些差异,企图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比较全面、比较细致的考察、研究藏传佛教音乐的工作并取得成果,难度极大。因此,虽经音乐学界多年的努力,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集中研究藏传佛教音乐的专著在中国问世。

正因为如此,多杰仁宗等四位作者完成的科研成果——专著《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在中国的民族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其开创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四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全面研究藏传佛教音乐的专著,虽然《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是一部集中研究青海省藏传佛教音乐的著作,而青海省的藏区又仅是藏族人民分布的五个省区的一部分,但由于藏传佛教音乐的高度统一性,此书内容体现出来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充分说明它远非仅仅是对某一民族的某一地区的宗教文化研究的局部性研究成果。对于藏传佛教音乐研究的总体领域来说,本书的内容、价值与影响,都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

《青海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共包括八章内容。

第一章导论,作者阐述了对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认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的方法、思路与目标等内容,并对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二章,论述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历史、人文背景。作者从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论证华夏文化与高原文化的联系,探索青藏高原的原始



乐舞。其后简明扼要地综述藏族的历史文化,梳理了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传播、发展的历史脉络,论述了唐代以来佛教文化对青藏高原人民的影响。

第三章,内容集中于宗教乐舞。论述藏传佛教乐舞体系的形成、发展、成型,列举了格鲁、宁玛、噶举、萨迦等教派的主要佛事活动及活动中的宗教乐舞。阐述藏族最重要的古代音乐论著——《乐论》(藏语为“瑞米丹决”)(¹²)的问世,是藏传佛教音乐形成体系的标志。

第四章,集中于寺院的诵经音乐。细致地描述了藏传佛教特有的诵经音乐的超低音发声方式,并根据诵经的音乐形态,及其近语言或近音乐的关系,将诵经音乐分为念诵形态(藏语“顿”,doen)、吟诵形态(藏语“达”,doc)、唱诵形态(藏语“央”,yang)三类,并逐一分析其音乐特点。文中还阐述了僧人在诵经时手印动作具有的特定含义,以及诵经声乐中增加器乐伴奏的表现效果。

第五章,介绍宗教音乐中使用的乐器。文中细致地论述了藏传佛教音乐使用的各种乐器的形制、特征、种类、功能。

第六章,研究藏传佛教寺院特有的乐谱——“央移”。指出藏传佛教的乐谱包括图形符号类、文字类、图文综合类等三种类型,并分别举例,加以分析。

第七章,概括地论述各教派寺院的法会仪式仪轨及仪式音乐。在诵经仪式方面,文中列举了正月法会与其他法会;供养仪式方面,列举了香火供养、食子供养与乐舞供养。对不同仪式中的器乐也分别加以分析研究。

第八章,本章是一个大型的个案考察,是针对青海著名格鲁派大寺塔尔寺佛事活动及宗教乐舞的调查研究。在这一章,作者选择了青海最有代表性的寺院——塔尔寺作为观察、研究的对象,文中首先介绍塔尔寺概况,描述了该寺一年中的主要佛事活动及在活动中表演的乐舞“羌姆”,接着分析了塔尔寺羌姆的历史渊源、音乐特点、乐舞种类,最后选出塔尔寺乐舞《曲嘉法王》(大威德金刚)羌姆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独有的乐



舞《马头金刚》羌姆作为典型代表,做更为细致的考察研究。分析了这两部大型乐舞的主要角色、乐队、乐舞程式、乐舞内容、乐舞谱例。

阅览全书之后,我冒昧地作出以下评价:

“本书是一部优秀的民族音乐学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学术上已达到国内外领先的水平。其特点是:(1)内容比较全面。(2)考察工作比较细致。(3)研究比较深入。”

既然评价本书在学术上已达到国内外领先的水平,为什么接连用了三个“比较”的评语?

答案是,藏传佛教博大精深,作为载体的藏传佛教宗教艺术(包括音乐)同样是十分丰厚、精妙的。目前国内外已完成的研究工作(包括本书),还存在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深入的幅度。举例说,宗教音乐对宗教观念、精神内涵的体现;藏传佛教音乐与苯教音乐的比较研究;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宗教音乐的异同对比;几类藏传佛教宗教音乐曲式结构的全局与细节的分析;各种仪式中不同的乐队全奏乐曲完整的记谱;诵经音乐特殊唱法“欧盖”的研究;羌姆乐舞中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等等。以上这些问题的深入解决,尚待我们去继续挖掘。

五

最后我要谈一谈本书的创作集体——本书四位作者中的两位少数民族作者,一位是藏族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多杰仁宗,青海省民族歌舞剧院的专职作曲、副院长,青海师大客座教授。他在少年时期就获得去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学习的机会,这为他的音乐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后来他由演奏专业转向理论作曲,一方面通过实践一步步积累创作经验,一方面去音乐院校作曲系继续深造,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曲技术理论修养。在多年的创作活动中,他创作了多种题材与体裁的优秀音乐作品,成为一位有影响的藏族作曲家。非常难得的是,多杰仁宗不但关注于音乐创作,而且在他多年向民间传统音乐学习的过程



中,从感性的热爱与艺术创作的探索开始,逐步深入、扩展,趋向追求理性的、客观的学术分析,开始对藏族传统音乐进行民族音乐学的探究。近十多年来,多杰仁宗一直在执著地进行青海藏传佛教音乐的考察研究,工作十分深入,已经在国内外音乐学术论坛上发表多篇有分量的论文。

另一位少数民族作者满当烈女士,是一位蒙古族艺术家,优秀的影视编导、剧作家,青海师大客座教授。她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曾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创作员、声乐教员、副团长,其后在青海省电视台文艺部、青海音乐家协会影视艺术中心担任编导工作和领导工作多年。从青海省“十佳女杰”、“百家优秀新闻工作者”、“十佳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她的工作业绩可见一斑。从她编创的众多获奖优秀影视节目,和她写作的文学台本、戏剧剧本、歌词等,可以了解她在民族文化与文学创作方面突出的修养与才能。藏传佛教也是蒙古族人民过去普遍信仰的宗教,因此对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也是满当烈对于自己母体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她和多杰仁宗在这项研究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母体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优势,配合尤为默契。她在藏传佛教音乐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已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引人注目。

另二位作者来自青海师大音乐系。

晁元清副教授,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是青海师大音乐系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也是一位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即使未能亲临她表演的现场,从琳琅满目的声乐表演履历表,也可以想见她在国内外舞台上纵情歌唱的风采。晁元清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和优秀的教师,而且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她的论著涉及面较广,包括音乐教育、声乐教学、歌剧研究、作曲家与作品、原生态唱法等。在她参与主持藏传佛教音乐研究课题之后,多次进行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撰写了塔尔寺羌姆与青海农村社火仪式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已先后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她的学术领域大为扩展,已经进入民族音乐学范畴。

王玫是本书最年轻的作者,青海师大的青年教师。她是三位年长作者